

“一带一路”倡议与 康德“永久和平论”：对话与超越

李 展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以全人类的福祉为最终追求目标，以道德化的原则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共商共建共享的路径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力求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为了减少它在西方理解中的文化误读，可以通过与西方哲学智慧如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对话”，以求得共识。启蒙运动晚期，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提出了实现国家之间永久和平的哲学原则，并对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两个多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先发展和后发展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仍然巨大。本文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设想了“永久和平”，更进一步提出“永久繁荣”，这是在哲学层面对西方思想的超越。为了取得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应着眼于向世界人民解读中国政府的高尚动机和行动，及其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具体贡献。

【关键词】 康德；人类命运；“一带一路”倡议；对话与超越；国际传播

一、“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倡议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当时媒体称之为“战略构想”，具体表述为：“纳扎尔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哈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①同年10月3日，

作者简介：李展，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① 中国网：“习近平在哈发表演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09/09/content_29968777.htm。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许多沿线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中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只有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②

可见,在“一带一路”提出的初期,对于它的定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在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之前,媒体普遍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战略构想”(直译成英文是“strategy”)。论者称,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不仅从经济上有助于中国过剩的产能走出去,同时在能源安全、地缘战略、反对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③;海上丝绸之路则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互联互通,有着显著的促进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的经济前景。^④

《愿景与行动》发布后,有媒体注意到应该如何称呼“一带一路”的问题,也就是,应称之为“战略”(strategy),还是“倡议”(initiative)?实际上,不同的说法会引发不同的联想。^⑤英文版《愿景与行动》的标题是“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⑥,中国国家英文报纸China Daily在报道此事时使用的标题是“Action

① 人民网:“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3/c1001-23101127.html>。

② 人民网:“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1107/c1057-25989967.html>。

③ 曹云:“丝绸之路经济带具四重战略目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0日,<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guoneixinwen/87180.html>。

④ 黄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内容及意义”,中国宁波网,<http://zt.cnnb.com.cn/system/2014/05/22/008068797.shtml>。

⑤ 王泳桓:《“一带一路”定位引发热议:是战略还是倡议,这很重要》,下载自: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5260。

⑥ 下文中所有引用《愿景与行动》的内容见国家行政学院网站登载的中英双语文本:http://jhzggs.nsa.gov.cn/bilingual_view.php?NewsID=314。

plan on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而国外英文媒体普遍使用的术语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或简称为“BRI”。实际上，将“一带一路”称为“倡议”而非“战略”，是对《愿景与行动》所体现出的核心思想的最贴切表达。通观《愿景与行动》的中英文文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应对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新格局。“倡议”与“战略”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自愿、共建、分享的原则，而后者往往强调某一方的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宣称，建设“一带一路”的行动会“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联通欧亚非大陆，并对全世界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设六条国际经济走廊，实现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正如《愿景与行动》所言，“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拥有高尚的动机和可信的原则，也有潜力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响应和共识。

二、“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传播中的误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有空前道德高度的世界性倡议，并为新世纪、新世界发展提供方案，它不仅是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重点主题，也获得了国际媒体的大量关注。在国际舆论中，既有对这一倡议的赞赏和正面回应，也存在着各种误读。

误读集中于一点，就是用“战略”而非“倡议”来理解“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动机、目标和行为逻辑产生误解。这种误读多来自西方。有些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中国欲借此与美国争夺在亚洲的权力；还有些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是时候要抗衡美国和欧盟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了。^①

为何会产生这种误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和修辞的使用。例如，有些西方学者指出，《愿景与行动》的英文版语言“混合了中国传统的外交语言（如强调主权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和一种新的修辞重点，突出强调国际规范和高水平”，但是，“充

^① Overholt, W. H. (2015). One Belt, One Road, one pivot. *Global Asia*, 10 (3). Retrieved from: <http://www.docin.com/p-1736524931.html>. T A C C, <http://tass.ru/ekonomika/4322473>.

满了中国式的语言和修辞方式，往往让外人很难看懂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①换句话说，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愿景与行动》这一标题的阅读预期是明确的要怎么行动，但是读起来发现，文本的表达方式是“充满诗意的”，而不是理性思维意义上的、我们通常说的有明确的“操作定义”的语言，因此，这“给解读《愿景与行动》增加了困难”。^②

上述文章还特别提到，英文版《愿景与行动》中充满了“我们应该”(we should)这样模糊的中国式表达，还有很多排比句，给不同立场和语言习惯的读者留下较大的解读空间。从逻辑主语上来说，却很难确定“我们”指代的主语到底是谁，是指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和未来将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的政府。事实上，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读中文版本的《愿景与行动》也会有一定的理解模糊，这是因为相当多的句子没有明确的主语，例如“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等，既可以把“中国政府”当作逻辑主语，也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当作逻辑主语。对照英文版本则可以看出，在英文版中，是有明确的主语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the Initiative)。但是从中文的语义上来说，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逻辑主语是“中国政府”，愿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邀请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共襄盛举，有时候又会让人觉得逻辑主语是“一带一路”，并且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实体，而非尚未实现的“愿景”。

语言和修辞固然重要，但并非根本原因。国际传播中文本的多义性当然要比以单一语言向同母语的读者传播更为复杂。但是对于来自西方的误读，即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争夺世界霸权，本文认为，其根源主要是过去两百多年，西方殖民主义主宰的不道德的全球化过程给世界人民留下的认知误区，或曰历史阴影。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根深蒂固，使得这一范式的话语体系占据霸权地位，也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没有得到准确的解读。

三、西方殖民主义全球化及其话语体系

从16世纪开始，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三次殖民主义式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带来了不平等的秩序。16世纪，欧洲列强开始迫使美洲、非洲和亚洲被动地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以西班牙和奥地利为核心的霸权^③；19世纪，欧洲列强和美国进

① Du, M. M. (2016).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ntext, focus, institu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2), 30-43, p. 35.

② 同上。

③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一步迫使美洲、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①；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借助三大国际经济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意识形态。^②而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肇始，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

启蒙运动一方面可以说是全人类对自身理性力量认知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造成当今世界不平等格局的重要因素。启蒙运动带来的科技进步使得西方列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自然界和外国人民的力量，他们携坚船利炮，将世界版图内的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卷入对其自身不利而对殖民者有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并不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的终结，它在当今仍然有力地以非武力的方式，即话语权，来定义世界上非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的众多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西方殖民主义通过两个层面取得胜利，一个层面是通过“直接占领、非直接统治、不平等贸易、强行托管金融体系、杀害或驱逐殖民地的原住民代之以欧洲人”等方法来实现，另一个就是通过“权力/知识话语”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让殖民地人民在“认知结构、意识、情绪和行为上都按照殖民者的标准去规范自身”，自动将自己放在低下的地位。^③

一些殖民主义者以科技文化发展的优势塑造了自身是高等文明、高等人的话语体系。殖民主义者将殖民地视为西方科技和思想成果的实验室，他们在印度建造了英国学者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在印度最早施行用指纹确定人的身份；举凡西方的“政治家、殖民地管理者、外交人员、军人、商人、学者”，到了殖民地都会致力于研究殖民地人民的心性和生活、文化特征，目的是更好地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统治，并在此过程中自我确认西方殖民者的优越文化地位。西方殖民者利用传教士在殖民地创办医院、西式学校、推广基督教信仰，“当西方列强以炮舰外交强迫殖民地首领对殖民者开放商业、开放传教活动时，他们非常满意传教士在‘规范’殖民地人民方面所起到的作用”。^④殖民者办的学校也是向殖民地人民灌输殖民主义话语的重要渠道，他们用西方的文化传统培养殖民地人民中的精英，把他们塑造为模范被殖民者，进一步传递欧洲人所代表的高等地位。^⑤

①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② Smith, T. (1994).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③ Sadi, A. H. (2014). Colonialism and surveillance. In K. Ball, K. D. Haggerty and D. Lyo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 (pp. 151-158). London: Routledge, p. 151.

④ Sadi, A. H. (2014). Colonialism and surveillance. In K. Ball, K. D. Haggerty and D. Lyo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 (pp. 151-158). London: Routledge, p. 155.

⑤ 同上。

在这种殖民话语体系中,被专业社会团体所创造出的核心概念“种族”(race)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19世纪英国成立的各种专业学会,如原住民保护研究协会(1837年)、伦敦民族志学会(1843年)、皇家人类学学会(1863年)等运用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将人分成不同的“种族”,这个概念将自然人天生的生理特征与心理、行为和气质特征关联起来,并据此将不同的种族放在了进化树的不同等级上。例如,用大量的所谓证据“证明”黑人是个在智力、道德和文化上低下的人种,必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才能进步。^①虽然已经有无数的科学研究从基因的水平上证明人类根本就是同一个物种^②,但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种霸权式话语成功地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接受”了不平等的世界格局。

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让殖民统治者、殖民主义国家的一般公众、还有广大的被殖民者,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公众,都“接受”了殖民主义者是文化上的高等人,进而承认殖民主义具有历史正当性。这种观念延宕至今,仍然余音未绝。2017年9月,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国际期刊《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发表了一篇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吉雷的文章,公然为殖民主义唱赞歌,倡导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主动仿效或接受殖民统治,甚至鼓励西方国家在一定情形下直接占领新殖民地。^③这篇文章以及《第三世界季刊》马上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内森·罗宾逊在网上期刊《时事政治与文化》(Current Affairs A Magazine for Culture & Politics)发表了文章,论述“为什么殖民主义是坏的”,指出殖民主义话语的霸权性体现在:时至今日,“大多数英国人仍然为殖民主义和大英帝国感到自豪”,“美国人仍然对(北美殖民者造成的)土著人民的困顿感到无动于衷”。^④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尽管有联合国的存在,有“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关系原则,但是在苏联和美国主导的所有大地理范围的国际合作中,人类没有见过像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出的,以追求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为目标的、美好的、合乎道德的国际合作原则和实践。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西欧建立开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看到的国家间的关系,都是以强权为基础的现实政治的博弈。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建设“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

① Ryan, J. (1997).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Reaktion.

② Li, W. H., & Sadler, A. (1991). Low nucleotide diversity in man. *Genetics*, 129, 513-523.

③ Gilley, B. (2017). 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01436597.2017.1369037>.

④ Nathan Robinson. (2017). A QUICK REMINDER OF WHY COLONIALISM WAS BAD, <https://www.currentaffairs.org/2017/09/a-quick-reminder-of-why-colonialism-was-bad>.

明互鉴之路”这一美好的合乎道德的愿望很难不会被误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从未真正见证过一个力量超强的国家真心实意为全人类的共同繁荣而努力，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容易引来各种角度的误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最合理的设定应当是一个“有道大国”。然而，这种形象的接受过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态势，非常有可能故意误读并有意传播。毋庸讳言，在当今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中，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倡导过打破英美垄断、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当时中国没有参与其中），却最终因美国的反对并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目前，英语仍然是全球信息流动的主要语言，中文并未取得主导性地位。在对外传播中，由于翻译带来的语言精妙内容的损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读，往往都会造成传播者自身赋予概念的内涵被信息接受者予以歪曲理解，更不用说由于文化间固有的差异造成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所带来的误解了。

四、从“永久和平论”到“永久繁荣论”：超越西方哲学话语体系

如前所述，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格局的原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神学的桎梏，社会契约论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组织形式的哲学基础和政治实践原则，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首先在西欧形成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真正开启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启蒙运动席卷欧洲和北美，启蒙主义思想家遍及英国、法国、苏格兰、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乃至俄国”^②，他们共同强调的启蒙主义理想，是“由人类的理性，而非信仰或传统来主导人类的行为”^③；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按照理性的科学规律运转的，可以被人类通过实验和观察的科学方法所认知和掌握，从而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人类进步的发动机，迫使自然为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幸福服务”，也就是说，个体的幸福和权利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④

① Balibar, E. (1991).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E. Balibar & I. Wallerstein (Eds.),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y (pp. 86-106). London: Verso.

② Kramnick, I. (1995). Introduction. In I. Kramnick (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pp. ix-xxvi). London: Penguin Books, p. x.

③ Kramnick, I. (1995). Introduction. In I. Kramnick (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pp. ix-xxvi). London: Penguin Books, p. xi.

④ Kramnick, I. (1995). Introduction. In I. Kramnick (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pp. ix-xxvi). London: Penguin Books, p. xii.

启蒙运动晚期,康德进一步强调了科学进步的道德涵义,认为“知识不过是通往终极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当知识可以用来为合道德的目的服务,它才真正有益于个人和社会”,而人类社会的道德目的,就是充分保障所有个体的自由和权利。^①在康德看来,经过启蒙洗礼的个人是自由的、理性的,所以能够在道德上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因而人类历史的进程也就成了“完全由自然和天意掌控人类生活到人类意识到自身的自由和理性后日益掌握自身命运的过程,因而历史本身是道德的进化过程”。^②康德同时看到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就是在追求满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他人产生的敌意,这种敌意是“充满所有人类关系层级的,从单个的个人之间到国家之间”,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充满斗争和敌意,但是作为理性的存在,人类的道德本质会让人类超越生物本质,“以社会契约为基础解决人类个体和集体的命运”。^③

康德认为,人类历史要实现道德化发展的进程,最大的困难在于要让不同的国家以社会契约论为原则结成一个正义的国民政体(civil constitution),因为国家之间结成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cosmopolitan state)的难度远远超过公民个体结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难度,但是,“只有单个国家都遵从统一的法律结成天下主义的国家,国家之间彼此不再有战争冲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保障所有个体的幸福和权利,才能真正实现”。^④康德确信,人类可以依据理性的力量,建立起国家之间基于契约的永久和平,并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建立和平联盟(league of peace)的原则,并且指出“理性可以让民族国家像个体公民放弃无法律的野蛮状态而组成民族国家那样,放弃只有战争关系的无法律状态,从而遵从共同的法律,建立起最终将包括地球上所有人类的人民共同的国家(a nation of people)”,^⑤这是联合

① Humphrey, T. (198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T. Humphrey,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1-17).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 2.

② Humphrey, T. (198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T. Humphrey,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1-17).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11.

③ Humphrey, T. (198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T. Humphrey,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1-17).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13.

④ Humphrey, T. (198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T. Humphrey,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1-17).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14.

⑤ Kant, I. (1983). To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1795). In T. Humphrey,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 107-143).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p. 117.

国理念的原型，即所有国家都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的成员，遵守共同的法律原则，和平共处，这是唯一能够保障所有人类个体权利的制度设计。

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表明，国家之间的各种条约没有终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20世纪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显然没有能够阻止人类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迄今为止，“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让人类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那种程度的人类战争灾难，但是历史表明，联合国的存在并未真正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当前的人类处境是我们这个物种拥有了足够毁灭自身数次的核武器和各种战争手段。同时，人类的道德进步每每受到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平等造成的制约。尽管如此，在西方，康德对人类理性终将带领人类自身实现永久和平的信心仍然存在。

虽然启蒙运动的精髓，即追求所有人类个体的幸福和权利，并没有得以实现，但它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思考人类共同命运上存在共通性。两个多世纪以前，康德在哲学意义上思考“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全人类命运，并抱着对人类理性的信心，指出了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哲学原则，期待人类历史开始道德进步的过程。然而，过去两百多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充满了战争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虽然联合国的成立与康德设想的各国之间的“和平联盟”原则相似，实行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议事原则，但是事实上先发展的国家和后发展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巨大的。康德设想的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联盟”保障地球上所有个人的幸福和权利更是遥不可及。与之相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类历史的道德化进程的一个新路径。

五、以对话促共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将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化为愿景与行动，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观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主义”哲学观在某种程度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可以通过与西方思想的建设性对话，促成全球的共识。这就提醒中国的国际传播，不仅仅要强调这一倡议中体现出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也要注重将“自己想讲的”和“西方听众能够理解的”结合起来。

其实，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高尚理念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道德担当，不仅容易被西方国家误读，对于身处“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的中国民众而言，也并不都能确切地领会其对于21世纪的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人民自身未来发展的意义。伴随着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已经

成为无数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热词，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创办了很多“一带一路”专项研究平台。但是，从大众传媒的读者的角度，要清楚地认知“一带一路”与广大中国国民的切身关联还需更多努力。21世纪的今天，媒体是塑造公众常识性认知和潜移默化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工具。因此，本文认为，担负国际传播责任的中国媒体，在各种媒体平台上选择报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框架时，需和西方文明开展更多的对话。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建议。第一，在哲学高度上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尚理念和追求。它绝不意味着中国相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为强大就自动带来所谓的“新殖民主义”^①，而是提出了新的原则、新的价值、新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现代化的结晶，也能够促成西方思想对康德哲学的复兴和提升。两者对话，能够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去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代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方式。第二，应该突出强调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愿景已经付出的具体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具体的好处。例如，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首期得到中国注资100亿美元。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再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7年5月，成立于2014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有77个成员国。媒体报道应该注重阐释这些付出和成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传统上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意味着什么。第三，应该微观具体地阐述“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世界民众的美好未来的关系。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民生故事、讲好世界共同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社会个体在这一倡议中真正获益的美好前景，促成全球共识。

2017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重述了他在2014年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时说过的一句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实际上，地球也足够大，容得下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将能够实现古今中外思想家们的理想，为世界创造更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姬德强）

^① Crozier, B. (1964). Neo-colonialism. London: Bodley Head.